

想象与形塑

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多元建构

XIANGXIANG YU XINGSU

XIN WENXUE XIANGTU XUSHI DE DUOYUAN JIANGOU

晏洁 著

雅外借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2016 年规划课题成果

【项目编号：HNSK (YB) 16-126】

想象与形塑

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多元建构

晏洁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想象与形塑：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多元建构/晏洁著.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 10

ISBN 978 - 7 - 5623 - 5846 - 6

I. ①想… II. ①晏… III. ①乡土文学-叙事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2829 号

想象与形塑：新文学乡土叙事的多元建构

晏洁 著

出版人：卢家明

出版发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510640)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 scutc1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020 - 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策划编辑：王磊

责任编辑：付爱萍 王磊

印刷者：广州市新怡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960mm 1/16 印张：12.5 字数：218 千

版次：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自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来，在与西方异质文化的对峙中，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都已显颓势。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启蒙知识分子认为“乡土性”是整个社会与文化停滞不前的核心原因，乡土由此作为一个问题被发现和提出。因此在启蒙乡土文学中，作家们认为尽可能地表现乡村的破败、乡民的愚昧、乡绅的精神统治以及乡俗的残酷，才能将乡土中国的顽疾公之于众，警醒民众抛弃在传统乡土中生长的文化和思维，从而再造文明。但是时代并未给思想启蒙足够长的时间，而另一方面思想启蒙并未如启蒙知识分子所愿，给社会进步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另一种更加快捷的改造社会的方法开始成为新的选择，此时富有语言冲击力、逻辑说服力的阶级革命理论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作为阐释阶级革命理论的方式之一，无论是早期革命乡土文学、左翼乡土文学，还是解放区文学，都遵循着阶级革命理论的基本原理，并以此原理为方法去寻找乡民贫困的根本原因和解决之道。在阶级革命话语框架之中的乡村，其贫富对立的乡景、乡民与乡绅之间的阶级矛盾、旧乡俗与新乡俗之间的博弈，构成了阶级革命乡土文学的主要书写内容。然而在启蒙乡土文学和阶级革命乡土文学之外，还有一种以审美意识为创作主旨的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由于脱离了急切的启蒙焦虑和激进的革命言说，自由主义乡土文学创作融入了作家个体的情感体验与艺术审美，使其呈现出平静从容的乡土意象：优美的乡村风景、单纯和谐的乡村社会关系以及维系传统的文化记忆。以上三种不同类型的乡土文学之间既有历时性的前后交替，也处于共时性的文学空间，但在这三者的作品中却呈现出几乎完全迥异的乡土社会。

面对同一历史时期的乡土社会，作品中出现如此不同本质的乡土文学意象，如果将这些异质共存的乡土文学意象理解为只是作家们的虚构和想象——当然虚构与想象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特点，那么对于它们的解读和研究应该停留在文学场域之中。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经过后世不断地重复阐释，不仅普通读者，甚至连研究者都逐渐将这些文学意象等同于历史意象，从而形塑了乡土的历史叙述。文学文本转变为历史文本，这远远超越了前者所承载的叙事功能。这一现象促使我们追问：在这些文学作品中错



综复杂，甚至于互相矛盾的乡土意象是否并非虚构与想象？如果不是，那究竟又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乡土的现实状况，以至于能够毫无冲突地被历史叙述所接受？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书试图以乡土文学中的乡景、乡绅、乡民与乡俗四个叙事主题为切入口，通过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互动与对话，尽可能地接近历史原场，深入叙事话语内部，去发现乡土文学意象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交织与背离之处，从而厘清乡土文学意象与历史意象的关系，让乡土文学重回文学研究的场域。就乡景叙事而言，乡土风景是以文学描述的方式引导读者产生相应的视觉图像，因地域、气候不同的自然风景与因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而不同的人文景观，通过文学创作相异的切入视角，一方面编织出多元化的文学图像，而另一方面，雷同的乡景描写却抵达了不同的叙事目的地。乡绅叙事与乡景叙事相比，其存在的历史问题使文学书写更趋于复杂和多变。作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群体，乡绅在乡土文学中呈现出既有正面肯定但更多的是负面批判的形象，笔者通过考察乡绅形象的历史存在与文学叙事之间的多角度对比，重新理解乡土文学叙事中的乡绅形象多样呈现的真正动因。而乡民叙事在乡土文学中则经历了几乎相反的逆转和对立的呈现，从启蒙乡土文学中无主体意识的愚昧乡民形象到阶级革命乡土文学中具有理性判断的政治主体，还有自由主义文学中平和无为的自在乡民形象，乡民作为乡土社会结构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学中如此矛盾与多面相地呈现，究竟应该如何去把握？而对于乡俗这一历史存在物来说，本身是无法虚构的，但在不同的文学创作话语中，乡俗与其他三个叙事主题一样展现出模糊而又矛盾的面相，在被批判为旧礼教的同时，也被当作可以传承的历史记忆，既是被扫进封建故纸堆的糟粕，又是可以被植入新内容加以利用的传统形式。

当我们站在今天这一时间节点回望新文学乡土叙事，就会发现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应运而生的乡土文学，不仅见证了现代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以主动的姿态积极参与了历史构建。尽管乡土文学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硕，但我们仍然有必要在研究中秉持历史意识，以文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双重维度，而非单一的文学维度，重新进入乡土文学的文本，重返乡土文学发生的历史原场，以客观理性的学术态度，尽可能地还原被文学创作的多重视角所塑造或遮蔽的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重构新文学乡土叙事研究。当然，这只是本书想要达到的一个美好的学术愿景，囿于本人的学术能力，也许研究所展现的与此愿景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真正到达仍需继续努力，但我想无论如何，在此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将逐渐靠近这一学术愿景的有益的尝试。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多元建构的乡景叙事	8
第一节 启蒙主义视角下的乡景叙事	8
一、发现乡景的视觉体验	8
二、乡景书写的崩溃预言	11
三、传统乡土社会的历史分析	17
第二节 阶级革命视角下的乡景叙事	22
一、贫富阶级对立的革命乡景	22
二、革命乡土叙事的乡景寓意	24
三、乡村社会现实的理性辨析	31
第三节 自由主义视角下的乡景叙事	35
一、自由主义乡景的创作理念	35
二、传统桃源想象的现代重构	40
三、民国乡土社会的现实危机	46
第二章 多元建构的乡绅叙事	53
第一节 启蒙主义视角下的乡绅叙事	53
一、思想启蒙话语的批判逻辑	54
二、启蒙乡土文学的传统符号	57
三、传统现代之间的先行智者	65
第二节 阶级革命视角下的乡绅叙事	70
一、乡绅文化身份的理论剥离	70
二、革命乡土文学中的阶级敌人	73
三、传统乡土社会的维持力量	81
第三节 自由主义视角下的乡绅叙事	88
一、自由主义作家的传统守望	88
二、自由主义作家的故园追忆	91



三、民国时期乡村的劣化乡绅	93
第三章 多元建构的乡民叙事	97
第一节 启蒙主义视角下的乡民叙事	97
一、思想启蒙话语的批判对象	98
二、传统乡土社会的麻木乡民	101
三、启蒙知识精英的两难处境	106
第二节 阶级革命视角下的乡民叙事	109
一、革命乡民叙事的理论基础	109
二、革命赋予乡民的思想提升	111
三、乡民参与革命的生存动机	115
第三节 自由主义视角下的乡民叙事	119
一、书写质朴乡民的创作缘由	119
二、乡民文学形象的诗意书写	121
三、乡民守成投机的主观遮蔽	125
第四章 多元建构的乡俗叙事	130
第一节 启蒙主义视角下的乡俗叙事	130
一、启蒙文学叙事的礼俗之辩	130
二、启蒙文学叙事的乡俗写意	134
三、中国乡俗文化的文化根性	139
第二节 阶级革命视角下的乡俗叙事	142
一、现代革命话语的批判逻辑	142
二、革命意识形态的旧俗终结	144
三、革命乡俗叙事的精英实质	152
第三节 自由主义视角下的乡俗叙事	157
一、自由主义作家的乡俗理念	158
二、文化保守视角的情感记忆	161
三、民间文化心理的历史思辨	168
结语	172
参考文献	178
后记	191

绪 论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乡土”是其丰富的创作资源与文化资源。在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里，“乡土”作为一种生存常态与思维方式，在无其他异质参照物可以进行横向比较的情况下，“乡土”并未作为一个概念或问题被单独提出和意识到。但自近代以来，“乡土”在与西方的角力中逐渐被发现，在不断被西方人所描述的中国形象中，“乡土”意味着远离现代文明的原始与落后。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接受了他者对于自我的这种定义，“乡土”以一个“问题”的方式出现在了通往现代的道路上。当文学主动参与现代的建构，作为问题的“乡土”被当作一个反复言说的创作主题，这就不仅是一个新的文学概念的发明和新的文学形态的创造，更是关于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与阐释。

“乡土”一词在汉语中实际上是有着两个表达独立意义的单字所组合而成的。从“乡”与“土”分别的释义来看，显然“土”远比“乡”的出现更早，因此我们需要从“土”字开始去深入探讨“乡土”的深层内涵。“土”在《辞海》之中首先被解释为“地面上的泥沙混合物；泥土；土壤”，这是“土”字存在的本真所在，正是依赖于植物在泥土中的生长，才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才有了人类的繁衍生息与族群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土”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圈定领地、争夺土地是早期部族与社群能够存活下去的主要方式。正由于此，“土”字的意义延伸为“土地；国土”，而一地一国之士与生于斯、养于斯的人来说，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情感上都有了紧密的联系，从而“土”再继续演化出“本地；家乡；乡土；如故土”^①的内涵。“土”这个字从单纯的一种物质名称开始，含义逐渐丰富，甚至与个人身份与情感记忆联系在一起。再来看何谓“乡”。在《辞海》中，“乡”的第一个解释就是“我国农村的基层行政区域”，所以“乡”并非如“土”一样是先验存在的，

^① 夏征农等：《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291页。



而是在有了国家统治之后才出现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统治方式。因此，可以说“乡”最初是具有政治性的，是与统治伴随而生的。那么“乡”为何又能与“土”合并在一起，表达相同的意义呢？最初作为行政治理区域而划定的“乡”由于所管辖的范围不同，使它成为一种与“城”相对应的名称，“泛指城市之外的区域”。此处的“乡”与出于统治而设立的乡，其范围与内涵已有所不同。与“城”相对应的“乡”不仅仅是行政管理范围，更是一种超越了统治区划的空间范围。对于传统农业社会来说，绝大多数人是生长在“乡”，而非“城”，因此，家在“乡”里，而非“城”里。“乡”被人们所认同的实际意义由最初的统治划分趋向于身份确认，籍贯可以代替姓名成为特定的称谓，例如唐代诗人韩愈被时人与后世尊称为“昌黎先生”，清末康有为被称为“南海先生”。由此可见，“乡”作为一种行政区划规定了空间的区隔，这种空间也预设了个人的身份归属，也就出现了“乡”的另一个延伸含义，即“出生地，家乡”^①。这个意义上的“乡”有着空间上的明确指向，同时这个空间指向也是一种时间指向，即家乡与成长记忆是连接在一起的，从而“乡”也具有了精神向度。当一些字与“乡”连在一起时，其词语也似乎有了情感温度，例如乡音、乡亲、乡情、乡思、乡关等，所以“乡”字具有了地域归属与情感归属的双重含义。

“土”由一种物质演化为“故土”，是缘于这种物质对于个人及社会生存发展的必需性，个人永远无法割裂与土地的关系，土地与个人、土地与家族之间形成了一种由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依存关系；“乡”作为最初行政区划的名称，自然而然地成为个人归属地的辨识坐标。当“乡”与“土”两个字连在一起作为一个词语出现的时候，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寓意与内涵。“乡”与“土”的组合不仅是“家乡，故乡”意义的重合，还是对于中国人不可离土的生存原则的强调，所以，乡土是不可分离的家乡。但这只是“乡土”一词的最为直接的意义所在，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来说，乡土的意义不止于此。乡土的意义延伸是从地域空间开始的，以此为起点，对于生活在乡土中的人来说，除了是一个规定性的生活空间，同时也是与个人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心理空间。乡土的环境造就了与此环境相适应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与心理习惯，这些习惯渗透于个体

^① 夏征农等：《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493页。

的日常生活之中，代代相传，成为乡间生活约定俗成的规则，从而由心理空间扩大为文化空间。乡土由一个实体存在的地域空间，转化为抽象的心理与文化空间，乡土成为心理状态、文化生态与思维模式的本质性存在，可以说，乡土实际上就是思维话语的深层结构。

“乡土”不但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还是一个安放中国文化的框架，由此框架产生的心理习惯与思维方式，当然也是以“乡土”为根源。“乡土”终究是安于土地的，因此它对土地之外的世界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它可以安疆拓土，徙民垦荒，一切都是在土地上做文章，即使外交也主要是展示天朝的威严与出产的富足。“乡土”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这个国家和人民不必与外界有太多的商业联系，也不必有太多的改变，就可以将一切很好地延续下去。但这只是主观的意愿，当世界逐渐由越来越多的新航路和源源不断的商品连接起来的时候，“乡土”中国暴露在了世界面前。对于西方外来者来说，在他们眼前所呈现出来的景象打破了传说中富裕文明的东方古国的想象，成熟的乡土文明变成了外国人嘲弄与猎奇的景观。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国在此时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孤立、无所适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此时的“乡土”尚未成为一个问题被提出、被讨论。但无论如何，中国与世界开始了双向的互动，乡土中国与外来文化终于在同一个空间与时间里正面相遇，对于自身而言，也就有了一个以他者为鉴的参照物。通过中国知识分子从内到外再从外到内的文化活动，“乡土”在他们的论述中凸显出来，被意识、被提出，逐渐成为话语的中心。对于“乡土”来说，它是因为与西方文化的异质不同而被关注到的，从而成为讨论场域中的主要话题，讨论的关键点就是如何去乡土化，使中国能够和西方同质存在。因此，“乡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必须直面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与思想问题，在当时的语境之下，“乡土”得到的是简单粗暴的对待，几乎所有的方案都集中在抛离乡土性，中国才有进入现代的可能性。

此时启蒙语境中的“乡土”是一个多重面相的复合体，从物质层面来说，它是可以直观感受到的、与城市相对存在的一种景观；从抽象层面上来说，它是一种文化或者思维形态。乡土文化形态与乡土思维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与作用，一方面，乡土文化形态规定着思维方式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乡土思维对乡土文化不断进行着塑造，最终乡土思维在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本质化，以无意识的方式嵌入日常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乡土”不仅是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也是一种思维形态，不仅是地域空间，也是文化空间，在思想启蒙话语中，更成为了一个历史空间。在这个复合体中，“乡土思维”正是其精神内核所在。毫无疑问，乡土思维是与农业社会相适而生的，它使中国达到了农业文明所能达到的巅峰，可是乡土思维的经验性与保守性，却使社会在遭遇大的变革与转型时，难以做出迅速的应对措施，即“乡土思维”如何转型成为“现代思维”。

“乡土”一词本来包含着国人对于家乡故土的记忆与情感，但是在以西方为镜鉴的映照之下，“乡土”成为落后的同义词和被鄙夷的对象，其内涵也丰富起来，一个简单的空间指称背后被赋予了历史评价，成为集地域空间、文化空间与历史空间于一体的复杂共同体。“乡土”不仅是中国社会性质的概括，更是文化特性与国民性的概括。无论是“老大帝国”“病国”，还是“东亚病夫”，无一不是对“乡土”中国的贬义或者歧视性评价，无论是以优越者自居的西方对中国的如是称呼还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无自卑的自喻，“乡土”在思想启蒙的时代语境中走到了必须抛弃自我、重新塑造的地步。于是知识分子们以各种方式阐释乡土的过去与现在，以此隐喻乡土的未来，阐述的话语不尽相同，但是基本的目的却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要将“乡土”彻底改变，从社会性质到思维方式。在阐释目的的规定之下，如何将改造“乡土”描绘得让读者更加容易接受并认同，文学作品无疑是一个最好、最亲民的选择。这个方式的选择除了与受众的认知水平有关，还与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有关，这其实又是一个悖论，阐释者正是在用乡土文化土壤所产生的思维模式在进行反“乡土”的文化行为。因此，如何真正地摆脱“乡土”这个无形的思维框架，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从晚清开始，将中国改造为西方式的现代国家是知识界的普遍共识，“乡土”无可争议地成为各种思想观点交汇的聚光点。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乡土”不仅是一个文学创作题材的问题，更是一个诠释思想观点的容器。在讨论“新文学乡土叙事”之前，需要对“新文学”的范畴作一个基本的界定。就文学史的一般认知而言，“新文学”一词有特定的意义，它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是在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文学作品。具体来说，就是从文学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生期间的文学创作，时间跨度在10年左右。1949年之后进行文学学科建设，以1919年五四运动的

发生为起点至1949年为止划为现代文学，那么作为一个文学思潮运动的“新文学”就成为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季剑青认为“‘现代文学’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取代‘新文学运动’这一特定历史要求的结果”^①。也就是说，用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这一概念，或许有一些非学术的因素占了比较大的比例。那么新文学的概念是否依然有效，还是只是成了一个历史名称，需要来做重新思考。新文学之“新”显然是出于与旧文学相区分的目的而命名的，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不管新文学与旧文学是否有本质上的差别，或者文体形式上有多少变化，都应该看到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异于旧文学的新质进入文学中，如创作理念、创作主体身份等。这些新质是在一个缓慢的过程中逐渐进入新文学的，所以新文学的“新”不但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属性与结果，更是一个动词，意味着一种持续变动的状态。从新文学发生以来，不断有新质注入其中，启蒙主义思潮、阶级革命思潮等各种思想运动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在不断涌动，潮起潮落，文学也以其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与责任感主动地参与其中，文学一直处于变化、未完成的“新”状态之中。当我们回到文学自身，自文学革命开始的“新文学”仍然处于自我更新的历程中，仍然在不断寻求表达以及如何表达的探索中。因此，对于文学革命以来的中国文学来说，新文学更加能够恰如其分地体现其属性与本质。

自新文学发生以来，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使文学创作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就乡土文学作品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叙述视角，即启蒙主义、革命理想主义与自由主义。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划分这三个视角并不是认为它们之间完全独立，截然分开，恰恰相反，无论从作家创作理念与作品出现的时代来说，它们都相互交织。有的作家思想构成复杂，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创作，同时晚清以来曲折的社会发展与历史进程，夹杂着各种各样的思潮，也难以用三种视角来简单区分。但总体说来，改写历史、追求现代在近代中国都是不过时的时代主题，因此我们从这个主题出发，在错综的文学现象之中仍然可以确定一些主要的脉络：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如何使习惯于乡土传统的乡民成为现代国家的国民，是那些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无法放弃的创作动力，因此

^① 季剑青：《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历史考察与再思考》，《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启蒙主义视角在整个新文学进程中都是存在的；“革命”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而阶级革命思潮从边缘到主流的过程，也是阶级革命乡土叙事从开始走向顶峰的过程，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它更是由一种文学叙事变为国家叙事的模式；自由主义视角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文人视角，因其自身的缘情的文学属性，使它在急于建构宏大叙事、指导历史发展方向的新文学中，逐渐走向边缘，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传统，它的生命力却是顽强的，在时代的夹缝中仍然能够找到自我存在的空间。

在晚清以来的各种救国与治国的改造良方中，“乡土”都是无法绕行、至为重要的焦点所在，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作家们带着各自的创作理念进入乡土言说场域之中，选择以书写乡土的方式加入时代宏流，去创造历史和参与历史的书写。对于启蒙主义者而言，“乡土”是一个历史空间，承载着这个老大帝国沉重的文化负累，只有抛弃才能获得新生，拿到进入现代世界的入场券，否则不是自我消亡就是被他者灭亡。因此，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源自乡土的传统文化给予全方位的否定，这样的否定在乡土叙事中就表现为用文学解构“乡土”。或者说，启蒙乡土叙事在解构“乡土”的同时，也重新制造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遵循着新的话语规则，而这个规则正是以颠覆传统为前提而制定的。启蒙主义乡土叙事在某个时期成为叙事主流，但是在作家们描述现象与提出问题之后，解决问题却后继乏力，整个知识阶层并未有能力将启蒙继续下去，或者说此时启蒙知识阶层的分化使启蒙受到了质疑与搁置。阶级革命学说以极具冲击力的理论迅速将相对温和的启蒙主义挤出了思想主潮，阶级革命理论有着严密的、自成一体的逻辑性，它以先锋性的阶级话语成功地重新解读了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革命理想主义乡土叙事按照阶级革命的理论逻辑进行创作。因此与启蒙乡土叙事解构传统乡土不同，革命理想主义乡土叙事在解构传统的同时建构了一个全新的阶级乡土社会，将传统乡土带入了从未进入过的政治空间。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曲折蜿蜒，思潮迭起，但是在纷乱的现象之中，自由主义乡土叙事却上承古典文学传统在各种思想博弈的夹缝中生存和延续，它以一种边缘消极的姿态、冲淡的文字为“乡土”塑造了不同于启蒙主义与阶级革命视野的另类历史与话语空间，与前两者的乡土叙事空间共时异质存在。如果说想象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的话，那么自由主义作家在时代主流之外展现了想象“乡土”的另一面，同时也

在自晚清后改造乡土的共识之外，提供了另一个思考的途径，去重新审视现代文明与传统乡土社会之间的关系。

因此，“乡土”在现代语境中已不单纯是对中国社会性质与经济形态的定义，也不仅仅是多种思想观点对话与话语交锋的场域，而是有着丰富的内涵，交织着历史积累、政治言说与文化冲突的叙述空间。通过文学叙事，“乡土”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乡土地域本身，而多重的叙事与多元的视角也使“乡土”成为众声喧哗的“乡土”——在被表达的同时，也在表达着自我。



多元建构的乡景叙事

当风景进入到文学叙事中，其外在呈现就不得不受控于作家所处的观察视角。启蒙主义作家透过风景描写去实现自己设定的叙事目的。启蒙主义乡土叙事中的乡景无疑是破败凋敝的；阶级革命乡土叙事中的乡景被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贫与富、善与恶都隐藏在外在的风景之下；自由主义乡土叙事中的风景是走出乡村再折返回乡的作家们重新发现了乡村风景不同于都市文明的淳朴之美。客观存在的乡景呈现如此复杂多变的面相，不禁令人迷惑。当乡村风景不止于一种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要参与到社会历史建构中去，形成历史性的整体意象时，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回到文学言说的原场，去找寻文学叙事影响历史的原因。

第一节 启蒙主义视角下的乡景叙事

在启蒙乡土文学中，乡村风景无一例外地充满了无法救治的荒凉与颓废，可以说启蒙作家的创作是将乡村的破败展示进行到底。所谓“不破不立”，彻底的破坏才能迎来全新的开始，通过风景描写传达出对乡土社会无可救药的绝望感，才能从旧日传统里毫不留恋地破茧而出。正是从这里出发，对中国未来抱着美好期望的启蒙知识分子开始了由“破坏”到“新生”的思想启蒙之旅。

一、发现乡景的视觉体验

“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① 同样的，乡土风景对于乡土叙事来说，并不是单纯的风光描写，而是成了一种刻意为之的文字图像。尽管它不具备视觉图

^① [德]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像的直观感受力，但是通过语言的编织，可以调动更为丰富的情感与想象力，因此读者主动的阅读感受才是完成作家叙事目的的最后一步。实际上，就风景描写而言，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古代作家的游记作品，数量颇多，文学成就也很高，但古代游记作品中的风景与启蒙时代的乡景书写却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两者之间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同时启蒙乡土文学中的风景书写为何可以成为一种叙事而存在？需要我们来做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我们来看启蒙作家是如何“发现”乡土风景的。描绘风景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对于古代文人来说，山川河流、风花雪月皆可入诗入文，不论是精致优美的农舍山涧，还是豪迈雄浑的三山五岳，诗文中的风景不仅可以寄寓个人仕途抱负、抒发失意人生，也是借以逃避政治迫害或者进行论道悟禅的方式。因此古代文人是以自己的内心去揣摩身外的风景或者想象风景、欣赏风景，这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风景的“发现”有着本质的不同。众所周知，晚清之季，西方以一个侵略者的形象不请自来，首先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而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了与世界对话、以求改变中国的过程。他们终于“发现”，原来在天朝之外还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鸦片战争以后，一个异质文明渐次在中国人面前展开了”^①，西方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在中国传播，例如设立租界，大量的西方人进入中国，还有西方传教士利用科技活动吸引中国人，同时他们对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参与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近代历史进程。“当传教士最后集中于利用出版物来影响中国士人时，其以前努力传播科学的效果即开始凸显出来。西学本身也跨越中西认同的紧张（tension），获得了一个更具普世性的名称——新学。一旦不存在认同问题，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便如翻江倒海，形成一股巨澜。”^②这是一种从外向内的文化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也主动地向外界寻找新的知识来源。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挫败心理，对中国知识分子心理更是有着深刻的影响，举国上下弥漫着文化自信力丧失后的恐慌与亡国灭种的威胁。再加之1905年清廷废止科举，出于对国家出路与个人出路的考虑，使得留学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来自乡土

^① 高瑞泉：《进步与乐观主义》，《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7页。

^② 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见到的文明自由的异国，显然与身后那个故乡有着巨大的视觉反差，也自然形成了心理落差。这是在异国他乡以他者的身份“观看”的结果，其导致的直接影响便是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如何将在异国所“观看”的内容移植到本国，思想启蒙是他们找到的能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

启蒙一词来源于西方，“在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启蒙’一词，是指人对光明的自我寻找，而非‘智者’对‘愚者’的思想说教。”^①也就是说，西方的启蒙（enlightenment）以承认人本身具备理性为前提条件，因此也就不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启蒙者存在，启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与其他因素没有太大的关系。用康德的话来说，启蒙并不是一件多么高深与艰难的事情，只是需要个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②，唤醒自身的理性便可达到自我启蒙的目的。这与中国知识分子所认为和理解的启蒙有着截然不同的不同。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概念根植于以四书五经开蒙的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之中，同时作为“士”这一身份赋予了他们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③因此，启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士”这一身份所赋予的义务与责任，他们必须以“启蒙者”的身份对民众进行知识上、思想上的教育，与帝制时代所不同的是，此时的知识分子不再使用儒家经典作为教育的内容，而是使用他们所理解的西方文化。所以，此时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与被启蒙者的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其实质依然是传统的精英与愚众的对峙，表面上却表现为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与非理性、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两者的对立关系自然而然地出现了高低立见的价值判断。

因此，当乡村风景作为乡土中国的直观意象进入启蒙知识分子的视野之中，风景不再只是属于文人墨客个人的、单纯的应景或抒情之作，而是

① 宋剑华、张冀：《“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② [德]伊曼纽尔·康德：《对这个问题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美]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欢声对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③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页。